

贝林格言论选集

1973—1981

编者说明

本书收集了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 1973 年 3 月至 1981 年 3 月期间发表的一些重要讲话和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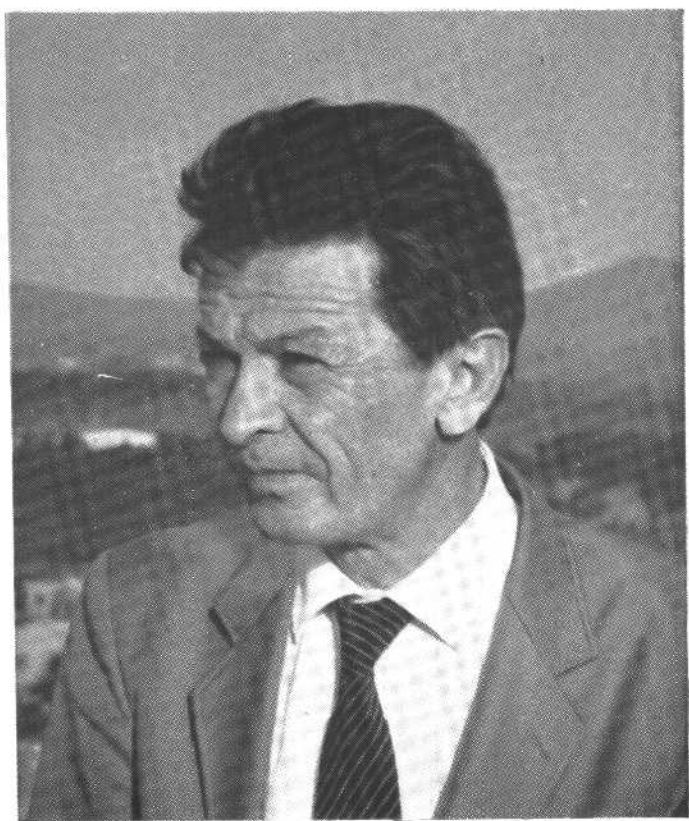
恩里科·贝林格 1922 年 5 月 25 日生于意大利撒丁岛萨萨里市，1984 年 6 月 11 日逝世。他的父亲马里奥·贝林格是社会党议员，是一位名律师，以坚决反法西斯著称。因此，恩·贝林格自幼受父亲和家庭的熏陶，十五岁时就参加过一些反法西斯斗争活动。他年轻时学过法律，因从事政治活动而中途辍学。1943 年他加入了当时处于地下的意大利共产党；1944 年初他因为参加萨萨里市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入狱，数月后被释放。入党后，贝林格从事青年工作多年，曾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萨萨里市基层委员会书记、共青团全国书记处书记；1949 年至 1956 年，他还担任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贝林格在党内历任要职。从 1945 年意共召开第二次大战后第一次公开的代表大会即第五次代表大会起，贝林格就当选为中央委员；1948 年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起，他又当选为领导机构成员。贝林格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战后他先后担任过米兰省委委员、撒丁岛大区党委副书记、拉齐奥大区党委书记等职；1960 年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他曾任意共中央组织部和书记处办公室负责人。1966 年至 1972 年意共设立政

2024/27

治局期间，恩·贝林格在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69年在意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贝林格当选为副书记，辅佐当时任总书记的路易吉·隆哥领导全党工作。自1972年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起，直到1983年3月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贝林格都连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除领导党的工作外，恩·贝林格还从事议会工作。从1968年起，他在历次大选中都当选为众议员。197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他又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

贝林格同志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于1980年4月曾率领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中断多年的中意两党关系由于两党的共同努力，从此得到正式恢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书选辑的材料虽然不够全面，但我们希望对读者了解意大利共产党的英勇斗争的历史和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会有所帮助。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书中加了一些脚注。



目 录

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生活中的影响	1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学院纪念陶里亚蒂诞生八十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1973年3月26日)	
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考虑	9
1973年9月28日、10月5日和9日在《再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帝国主义和共处	9
美国干涉的决定性作用	11
动荡和冲突的形势	12
为和平而斗争的两个方面	13
我们能考虑本国的全部历史	17
在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和平道路和非和平 道路之间作脱离实际的、公式化的抉择	21
通过民主道路改造社会，需要力量和民意支持	24
联盟是任何革命政策的决定性问题	26
为何意共主张民主代替，而不是“左翼”代替	30
同天主教界开展对话和讨论的三个方面	31
走向代表人民大多数的各种力量之间新的 伟大的“历史性妥协”	34
建立一个新欧洲	37
在布鲁塞尔西欧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 (1974年1月26日)	

两点要求	38
争取缓和	40
新的道路	43
在西欧发达国家战胜资本主义的各种新道路	45
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的米兰青年 集会上的讲话 (1976年6月6日)	
在柏林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发言	54
(1976年6月30日)	
对意大利电视台发表的关于柏林欧洲共产党和 工人党会议问题的谈话	65
(1976年7月1日)	
答意大利《共和国报》社长斯卡尔法里问	66
(1978年8月1日)	
意大利共产党在欧洲和世界上的行动	78
在意共全国咨询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4月2日)	
在北京大学集会上的讲话	101
(1980年4月16日)	
在罗马竞选集会上的讲话	109
(1980年5月4日)	
二十世纪的加里波第	126
在意共主席路易吉·隆哥葬礼上的讲话 (1980年10月18日)	
同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社长雷克林的谈话	136
(1980年12月7日《团结报》)	

在意共建立六十周年前夕答意大利电视台记者 皮耶朗东尼奥·格拉齐亚尼问	148
(1981 年 1 月 21 日)	
争取改变意大利和执政	152
在罗马庆祝意共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81 年 1 月 25 日)	
在都灵菲亚特厂共产党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74
(1981 年 2 月 15 日)	
同热那亚意大利造船厂工人的谈话	185
(1981 年 3 月 2 日)	
在卡坦扎罗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88
(1981 年 3 月 8 日)	
在意大利电视台答记者问	199
(1981 年 3 月 17 日)	

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 生活中的影响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学院纪念陶里亚蒂诞生
八十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1973年3月26日)

多年来，从事党校工作的同志们建议把佛拉托基埃^①共产党人学院命名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学院。今天，在陶里亚蒂诞生八十周年之际，这个建议付诸实施了。我们确信，不仅目前在我们中央党校工作和学习的教员和学员，而且还有那些将来要到这里来工作的人，都会理解这个为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设立的全国性学习中心用陶里亚蒂同志的名字命名这件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决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我们想借以在全党开展一次旨在使人认识、学习和深入研究陶里亚蒂的业绩和思想的活动。这个活动包括多种多样的政治活动、群众性活动和文化活动，将进行一年多，直到1974年8月陶里亚蒂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为止。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想为纪念而纪念，更不是想回击那些诋毁

^① 佛拉托基埃是罗马郊区一个地名，意共中央党校所在地。（本书的脚注都是中文版编者加的）

陶里亚蒂形象、并非新鲜的卑鄙企图，也不是仅仅为了驳斥和纠正某些肤浅的、歪曲的说法。我们打算制订并执行的活动计划符合一种要求，我们感到这种要求明显地存在于我们党的斗争、发展和理论建树的现阶段。与此同时，这种要求在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当中，在意大利的政治辩论当中，也越来越广泛地为人们所感觉到了。

实际上，正如隆哥同志昨天所写的那样，岁月的流逝远没有减少陶里亚蒂的遗产的价值和重要性，反而使他的遗产至今依然保存的有效性越来越突出了（尽管现在的条件同我们失去他时的那种条件相比，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使他对意大利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持有的分量也越来越突出了。

我们从陶里亚蒂思想中得到的教益是十分宝贵和现实的，因为在目前这个时期，意大利——也不仅仅是意大利——正经历着一个危机阶段，这个阶段充满危险，但也富有进行斗争、推进工人运动、推进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党需要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政治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一切都是党在陶里亚蒂领导下成长壮大的长期岁月中积累起来的。

国家经历的危机实质上是国内统治阶级失败的表现。统治阶级更加暴露了它们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的革新和进步问题，从而再次呈现出全面倒退以及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和道德上衰败的危险前景。

这样，在意大利再次极其尖锐地提出改变领导阶级和政治领导的问题。于是也就产生了确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领导职

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必须确认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和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职能：这个工人阶级要善于表明自己是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作为整个社会政治联盟的领导力量，作为能推动整个社会朝着一个新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全力以赴地进行活动的；这个共产党要善于日益成为进行这一斗争和改造的、为国家服务的工具。

正是因为当前的任务具有这样的性质和意义，作为共产党领袖的陶里亚蒂的业绩和教导的价值，才充分地显示出来。陶里亚蒂是这样一个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葛兰西赋予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战略和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思想的那个新方针，对建设一个有能力承担起如此具有决定性的责任的党，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诚然，为了理解陶里亚蒂的为人和业绩，也需要回顾那些最困难的时刻和情况，而不要害怕暴露矛盾乃至错误，但是，要把他个人的遭遇始终放在工人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以及世界革命前程这一总的条件之下来看待，因为陶里亚蒂是这一斗争和进程的主要战士之一和主角之一。只有这样才不会忽视两个主要因素，这两个因素为我们理解他的行为和品格的伟大提供了钥匙。第一，他有能力投入和参与世界生活的先进潮流之中，始终具有历史观念，把握历史时机和政治时机。第二，他有能力把一个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才能体现在他作为领袖的活动中，他为建设一个能把工人运动变为国家的历史和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共产党而奋斗。我认为，这两点正是陶里亚蒂在政治上最有分量的遗产。对我们来说，要关心对他的思想和活动的根源、过程和研究的发展，上述遗产是很重要的，也应当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感兴趣，并且也促使别人对此产生兴趣。

对我们来说，特别要紧的是要看到陶里亚蒂作为革命领袖和国务活动家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他的理论建树和实际活动的关键所在就是：他领悟到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毁灭和埋葬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那些财富和珍品这个历史阶段，工人运动为了要拯救和继承这个遗产而对全人类负有新的责任。陶里亚蒂完全根据这个放眼整个世界舞台的观点，指出了我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内方面的目标。这就是民族独立和民族团结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萨莱诺转折^①据以产生的首要原因，尽管有许多人忘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社会革新、民主与文明进步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的目标。可以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实现这种性质的目标的那个历史时期已告结束。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和领导权，通过所有人民力量的团结，遵循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的时代已经到来。正因如此，人们才有了这样的看法：认为无产阶级应把诸如南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天主教问题等这些意大利国内重大历史性问题当作它自己的问题，并以带有它自己特点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共产党没有变成一种丧失自己的阶级性质和国际主义性质、迷失自己最终的总目标、从而成为某种从属别人的力量的一般民主进步组织。与此同时，陶里亚蒂也拒绝任何一种把党看成排他性组织的观念，这种排他性组织硬认为只有它才能表达社会、

^① 萨莱诺是意大利南部一个中等城市。1944年4月，在这里成立了有意共等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参加的“全国团结政府”，亦即巴多里奥第二届内阁。这个政府是根据陶里亚蒂在1944年3月自莫斯科回国后提出的建议成立的。陶里亚蒂认为当时的任务是要抗击德寇和肃清法西斯残余，全国上下应团结一致。这项政策称为“萨莱诺转折”。

政治和文化生活当中的全部要求，才能代表所有进步革命运动。陶里亚蒂总是坚定地认为，革命行动不是宣扬一种模式，也不仅仅是为等待最后解决而进行宣传活动，而是意味着要不断地斗争和努力，以便达到某些目标，这些目标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正如陶里亚蒂 1963 年在贝尔加莫的讲话中所说，党“推动并吸引一些现实力量”，党“研究能否取得、怎样才能取得以及能同其中哪些力量取得相互了解，相互承认彼此的作用，从而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达成谅解和协议”，因为这些目标对全人类和全民族来说都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

这样，党就变成起领导作用的、同时又是坚韧不拔的力量，变成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主张团结的力量。某些有激进倾向和“为行动而行动”倾向的个人和小组，某些沿袭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纲领主义和宗派主义传统的派别，在评价陶里亚蒂和意共时，都理解不了这一点。否定或抛弃陶里亚蒂教导的这些基本内容，就必然陷入机会主义或一味蛮干的徒劳的行动之中，而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陷入从属别人的地位。

陶里亚蒂整个路线的团结性，不是由单纯的防御和策略要求决定的。正如他本人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的（这个报告对此作了明确而深刻的概述，今天值得许多人重温和思考），我们的无产阶级团结政策，我们实现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等人民群众的团结的政策，实现民主运动的团结、民族团结的政策，这“不仅对于对付法西斯复活的企图，对于纯粹为了防御而抵抗反动派的进攻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对于使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对于完成国家生活、国家的经济政治结

构、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际地位的彻底革新工作,同时使新的进步力量集团、使劳动阶级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进入国家领导,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当时陶里亚蒂还说,“我们这个总的战略目标,我们这条政治路线,绝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由抵抗运动取得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所造成的局面本身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如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甚至在联盟破裂和1948年发生向保守方面的转变之后,这条路线也依然是有效的和现实的”,因此,“在抵抗运动中和建立现行共和制度期间作为我们的指南的那个前景,并未关闭,相反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我们面前敞开着……这就是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景”。

但是,陶里亚蒂的新建树不仅在于他从对革命进程的看法和对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中得出的全部结论。他的新建树在于:他——请允许我用这样的说法——“发明”了一种类型的党,也就是他1944年称之为新党、群众党的那种党,就其结构、成分和工作方式来说,这个党变成了一个同真正实现和完成意大利历史和世界历史向它提出的目标 and 责任相适应的工具。

因此,这是一个民族的党,同时又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党,它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从来没有成为它制定和实行民族政策的障碍,而是恰恰相反,成为使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密切地符合本民族的历史和实际的一个条件和鼓舞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不曾有过采用不加批判的形式、华而不实和说教式的宣传形式、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进行歪曲宣传的形式去表现国际主义的时刻,而且陶里亚蒂本人也曾率先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如下情况也毕竟是事实:那

些错误已经被纠正、被克服了；我们在陶里亚蒂领导下取得的全部成就就是：有了一个在意大利生活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对世界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过去已作出、现在也继续在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共产党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陶里亚蒂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新型的知识分子。他立足于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曾为意大利造就了一些才华出众的国务活动家（只可惜太少了）和政治思想家。当然，也正因如此，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是一位实事求是、处事有节、谨慎而又机智的政治家。有人试图把陶里亚蒂描绘成那种浅薄和做作的人，与此相反，陶里亚蒂却是一个有伟大理想和火一般热情的人。他具有同人民群众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需要、疾苦和愿望，也让他们了解和爱戴他自己的非凡能力。他也就是依靠这种能力成为这样一个人，并且从中吸取营养的。他一生致力于为被压迫者的事业服务。由此也产生了他的人道精神和感情，他在道德上和思想上严以律己的精神，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勤奋态度以及作为领袖的严肃性。他的严肃性也表现在：他具有在处理各种关系中总是认真地、批判地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的作风。

陶里亚蒂的品格和业绩存在于意大利工人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他对意大利共产党有过决定性的影响）和意大利的现实当中，也存在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宝库当中。

他的教导必然是复杂的，要掌握他那十分丰富的教导是不容易的。他的教导也曾不断遭到那些流行一时的公式主义和陷于屈从别人的立场与观点的人的诋毁。然而，他的教导深深扎根于我们党那部分起决定作用的党员和干部的经验 and 心灵之中，扎根于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活动方式之中。我们认为特别重要和特别

有意义的一点是：他的教导在今天加入我们党和靠拢我们党的许多青年中间引起了新的兴趣和共鸣。

(译自贝林格《共产党问题》〔1969—1975年言论集〕

第二卷，意大利联合出版社 1975 年版)

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考虑

1973年9月28日、10月5日和9日在

《再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帝国主义和共处

智利事件是一个悲剧，是分布在各大陆的千百万人经历的一个悲剧。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指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引起人们对反动政变和屠杀群众的罪魁们的痛恨，激起人们对受害者和正在进行抵抗的人的声援，而且提出了一些使各国的民主战士们深为激动并促使人们思考的问题。

对智利民主、对智利的社会成果和劳动人民进展前景的这一极其严重的打击，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运动，对全世界工人和民主运动的一个打击，掩盖这一点是没有好处的。意大利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劳动群众、所有民主反法西斯人士，也都感到了这一点。

但是，正象经常对待其他一些如此激动人心的、如此严重的事件一样，为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或是仅仅表示反对和愤慨，相反，他们是力求从中汲取教训。在智利问题上，这一教训是直接触及广大世界人民群众的，它使那些尚未接受我们对今天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冲突的观点的广泛社会阶

层看清和了解这一事实的某些基本情况。这是促使人们广泛而积极地参加改变上述情况的斗争的一个必要前提。

首先,智利事件粉碎了各种幻想,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性,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仍然是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压迫和控制,仍然是侵略和掠夺,仍然是只要具体条件和力量对比允许,就企图压迫各国人民,使各国人民不能独立、自由和团结。

其次,智利事件充分表明,在所谓“自由世界”的国度,民主的敌人是什么人,他们呆在什么地方。多少年来,人们就向这些国家的舆论灌输这样的宣传:把工人运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说成是民主的敌人。今天,这些国家的舆论看到了一个新的鲜明例证: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或为他们效劳的各政党,一旦其特权和权力遭到打击或威胁,就随时都会破坏一切自由,践踏一切公民权利和人道原则。

共产党人和所有为争取民主进步和各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的任务就是,依靠对这些真理的越来越广泛的认识,来唤起所有的人对帝国主义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给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民族的独立所带来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承担民主和革命义务,以便使力量对比在全世界和每个国家里进一步向有利于劳动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整个民主及反帝力量的方面转变。智利事件能够而且应当在掀起声援智利人民的强大持久的运动同时,唤起民主意识的更普遍的觉醒,特别是引起这样的行动:使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具体斗争的新力量走上舞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也是必不可少的:认真进行思考,以便从智利政治悲剧中得出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判断